

创作特点与清廉思想

——于成龙诗词中清廉思想的研究之一

□ 闫卫星

于成龙,字北溟,号于山,生于1617年,卒于1684年,是山西永宁州(今山西省吕梁市方山县来堡村)人。他的一生经历了明朝末年的动荡和清朝初年的恢复发展时期。于成龙45岁出仕,历任广西罗城知县、四川合州知州、湖广黄州同知、武昌知府、福建按察使、布政使、直隶巡抚、两江总督等职。他的为官生涯以清廉著称,被康熙帝誉为“天下廉吏第一”。

于成龙是清朝初期的一位著名官员,以其清廉和勤政爱民而闻名于世。他的诗词作品,不仅反映了他个人的情感世界和审美追求,更是其清廉思想的文学体现。

于成龙诗词创作特点

于成龙不仅以其清廉的政治形象被后人所称颂,其诗词作品同样展现了其深厚的文学造诣和独特的艺术风格。他的诗词作品,语言朴实无华,情感真挚,形式多样,既有长篇叙事,也有短小精悍的绝句。他的诗词多以表达对民生疾苦的关怀和对清廉政治的追求为主题,反映了他深厚的为民情怀和高尚的道德情操。于成龙的诗词创作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:

1. 朴实无华的语言风格

于成龙的诗词语言朴实、自然,不事雕琢,这与他清廉朴素的个人品质相契合。他的诗词中少有华丽的辞藻和复杂的修辞,更多的是直抒胸臆,用平实的语言传达深刻的思想和情感。

2. 深厚的民本情怀

于成龙的诗词中充满了对民众疾苦的同情和关怀。他多次通过诗词表达了对百姓生活和民生问题的关注,体现了他深厚的民本思想。这种情怀也反映在他的政治实践中,使他的诗词作品具有了强烈的现实关怀和深刻的社会意义。

3. 高尚的道德情操

于成龙的诗词作品展现了他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清廉自守的个人品质。他的诗词中常常流露出对清廉政治的追求和对个人修养的重视,这种道德情操也是他作为官员从政的重要准则。

4. 真挚的情感表达

于成龙的诗词情感真挚,不造作,不矫揉。无论是表达对民众的关爱,还是抒发个人的情感,他的诗词都给人以真挚诚恳之感。这种真挚的情感表达,使他的诗词作品具有了强烈的感染力。

5. 多样的题材内容

于成龙的诗词题材广泛,内容丰富。既有反映社会现实、表达政治理想的作品,也有描绘自然风光、抒发个人情感的诗词。这种题材内容的多样性,展现了于成龙宽广的视野和丰富的内心世界。

6. 独特的艺术手法

在艺术手法上,于成龙的诗词也有独到之处。他善于运用比喻、象征等修辞手法,使诗词意境深远,表达含蓄。同时,他的诗词结构紧凑,布局合理,体现了他精湛的艺术构思能力。

7. 鲜明的个性特色

于成龙的诗词作品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。他的诗词风格独特,语言风格、情感表达、思想内容等方面都带有鲜明的个人印记。这种个性特色,使他的诗词作品在清初文坛上独树一帜,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文学地位。这些特点不仅使他的诗词作品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,也使他成为清初文坛上一位独树一帜的重要诗人。通过研究于成龙的诗词创作特点,我们可以更深入地

理解这位清初名臣的文学成就和艺术风格,也可以从中汲取丰富的精神营养和道德启示。

于成龙诗词中的清廉思想

于成龙的诗词不仅折射出其个人深厚的文学素养,更是其清廉政治理念的文学映射。在清朝初年,于成龙以其清廉自守、勤政为民的形象,成为后世官员的楷模。其诗词中的清廉思想,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。以下是对于成龙诗词中清廉思想的进一步深入分析:

1. 民本思想的深刻体现

于成龙在诗词中反复强调“民为邦本”的理念,他认为国家的稳定与强盛依赖于民众的幸福安康,这一思想在他的许多作品中都有所体现。例如,在《劝农积粟》一诗中,他写道:“劝农积粟,野果酿酒,不夺民食,以安民心。”这不仅反映了他关心民生的实际举措,也体现了他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。于成龙深知,只有民心安定,国家才能长治久安。

2. 勤政爱民的不懈追求

于成龙的诗词中充满了对勤政爱民理念的推崇。他通过诗词表达了对官员应勤勉工作、关心百姓生活、解决民众实际问题的期望。在《于成龙自勉》中,他写道:“人能弘道,非道弘人。”这句话强调了个人在政治道德实践中的主体作用,鼓励官员要主动作为,以实际行动赢得民心。于成龙本人更是以身作则,无论是在罗城知县任上,还是在两江总督的高位,他都勤政不辍,为民请命。

3. 清廉自守的坚定立场

于成龙在诗词中多次表达了清廉自守的重要性。他倡导官员应当廉洁自律,不贪赃枉法,不以权谋私,保持清正廉洁的形象。在《江月蹉跎六尺身》中,他表达了自己甘于清贫、为民服务的决心:“为民请命为民政,甘枕清贫报圣恩。”这种清廉自守的精神,是他为官从政的重要准则。于成龙的清廉,不仅体现在他个人的生活中,更体现在他的政治实践中。他严于律己,更严于律下,对于贪污腐败现象,他始终零容忍。

4. 反对腐败的鲜明态度

于成龙对腐败现象表示了强烈的反对和谴责。他认为腐败是社会的毒瘤,严重损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。在《于成龙劝农积粟》中,他通过提出务实的政策建议,展现了他反对腐败、倡导清廉政治的立场。于成龙在任内,大力整顿吏治,严惩贪污腐败,其清廉的形象深入人心。

5. 崇尚节俭的积极倡导

于成龙的诗词中还体现了崇尚节俭的思想。他提倡节俭为本,反对奢侈浪费。在《于成龙自勉》中,他强调了个人修养和道德实践的重要性,这也是他崇尚节俭、反对奢侈的生活态度的体现。于成龙本人生活简朴,他常常以身作则,带头实践节俭的生活方式。他反对官员奢侈享乐,认为这是败坏政风、损害民心的行为。

6. 于成龙诗词的艺术特色

于成龙的诗词作品,以其朴实无华的语言、真挚感人的情感和深刻的思想内容而著称。他的诗词语言简练,意象生动,形式多样,既有长篇叙事,也有短小精悍的绝句,体现了他深厚的文学功底和独特的艺术风格。于成龙的诗词,语言朴实而不失文采,情感真挚而不造作,思想深刻而不晦涩,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文学成就。

兴县孙氏一族,在明代中晚期属小康之家,上溯几代,无人取得任何功名,也未出过什么显赫人物。明崇祯十六年始有孙奕焕中进士,显宦大理寺卿,启官学世家之范。明末至清中晚期,兴县共取进士二十三名,其孙家就有十三名。最为耀眼的则是孙嘉淦兄弟四人,除长兄在博取功名之前就英年早逝外,其余三人均读书成均,考取进士,成为清代一个分外耀眼的文化世家,是清代晋西北名门望族的典范。“一门三进士”,成为三晋佳话,载入国史,流芳千古。

“一门三进士”,孙嘉淦最为显赫。他毕生以其突出的政绩和敢于犯颜直谏而蜚声朝野。

孙嘉淦于清康熙二十二年出生,五十二年“万寿恩科”中进士,殿试后又钦点翰林院庶吉士,散馆即授职编修。清代有“相必出于翰林”之惯例,点翰林向来被看作履宦之首。他人仕翰林院后,正值康熙帝最后当政时期,由于皇位继承人太子两立两废,出现了“九王夺嫡”的纷争局势,皇子间矛盾重重,因而孙嘉淦没有机会受到重用和显示其政治才能。他自己也不满足于翰林院编写文史之类的事情,便游于朱轼、张伯行门下,研求理学。朱、张二人不仅是康熙、雍正两朝重臣,而且是理学的研学者和实践者,不仅对程朱理学有一定的发挥,且身体力行,将理学的基本思想应用到行政中。康熙五十九年,山西发生旱灾,钦命朱轼到山西发放赈灾粮款,而孙嘉淦此时因母丁忧在籍守制,受邀至太原,与朱轼在政治上有了更多的接触和交往。后因上奏折,惹恼皇上,要杀之,还是朱轼出面解危,救他一命。张伯行的理学思想,在清朝亦颇有影响,在理学名臣中占有重要地位。孙嘉淦毕生为官主“诚敬”,则受益于此。

孙嘉淦在研求理学中,紧紧抓住“仁、义、礼、智”这一要义,并把它看作是修身治国齐家之首。他认为“大贤推孝悌之道,而得为仁之本焉。盖人能孝悌,则不仁之事远而仁道生矣。故为仁以孝悌为本也。”“君子之为仁于天下者,将使天下有治而无乱也。”“天下之乱,必有作之之人。其人而好作乱者,必自犯上始。其人而好犯上者,必自犯其父兄始。如其为人也,而孝悌矣。孝主于爱,孝主于敬,自鲜犯上之心。爱不恶人,敬不慢人,焉有作乱之事?……由是言之,孝悌也者,其为仁之本与?君子知其然也,故当其务本之始,各亲其亲,各长其长,只尽为人之本。及乎本立之后,不独亲其亲,不独长其长,遂致大道之行积。而至于人人亲亲,人人长长,则天下之乱果无由生矣。”在孙嘉淦的理学思想中,孝道是仁义中德的基础和出发点。他说圣贤人物之所以极力倡导孝悌之道,就是因为孝悌是仁义的根本。一个人能做到孝悌,就会远离不仁不义之事。因为具备仁义道德的君子,能够使天下有治而无乱。相反,好乱而不仁之人,往往会从犯上开始,而犯上者,又是从侵害其父兄开始。如果能做到在家孝父爱兄,那么在社会上就会爱上敬长。由亲亲之道推而广之,使天下人人亲,人人长,仁道就会施行,乱道就会消失。

孙嘉淦作为封建时代的官吏,自然打上了时代的烙印。他把自己所强调的孝道和仁义,进一步引申为对君主的“诚敬”。认为不孝者,绝谈不到忠诚和敬信。正是如此,他不顾个人安危,多次冒死犯颜直谏,表现出其对君主的忠诚。

孙嘉淦之所以敢于上疏谏诤,除了对君主的“诚敬”外,注重的是“穷理格物”,即张伯行的三句话:“奉主敬以端其



师拜朱张 精研理学

孙嘉淦的理学思想与履宦事功之一

□ 牛寨中

本,穷理以致其知,躬行以践其实。”就是每做一件事,都要穷究其具体的道理,使之合乎“天理”、“良心”,使自己的认识与“天理”一致,言行与“良心”契合。他从政四十余年,无论是庶吉士,还是掌院学士,或是三部尚书,一言一行,都详细考究其事物原始本末,从实际出发,使自己的主观意愿与客观实际相符,从而使政务得到顺利推行。他对官职大小和升降,都能随遇而安。他居官显赫,却又视荣华富贵如草芥,他身为朝廷命官,却不为官名所羁,早朝时还在金銮殿直言谏言,傍晚就入监狱,同样的敢作敢为,潇洒自如,闲庭信步。他阅尽世事沧桑,告老还乡时,只有五千块半砖,一个随从,一身轻松,平和得像个山野村夫。他何以能做到这一点?他所写的“君子素其位而行”一文,将自己理学思想阐释的入木三分。

“顾人之于位也,不患其身之不居,而患心之不安于所居。于是有所求于人,无所得于己,盖虚愿多而实行少也。若君子之于位,则素焉而已。位虽偶值而若固有之。在位之中者,不敢不行也。位虽暂处,而若将终身。有位之外者,不敢或愿也。富贵贫贱,位常而行其经;夷狄患难,位变而行其权。夫人有心而不自得,斯竟为累焉。今既尽其分而无歉,则天时穷而心自得其道,人事逆而心自得其顺也。其素位而行也如此。居上行上,不愿以上而凌下,居下而下,不愿以下而援上。夫人有求而不能得,斯怨尤生焉。今既正乎己而无求,则心自通而不知天之穷,心自顺而不知人之逆也,其不愿乎外也如此。”

孙嘉淦此文之意是,人们对于自己的地位来说,不怕身不在其位,而是怕心不安于位。如果心不安位,那必然要求别人来改变自己的地位,而在自己所处的地位中无所作为,只能有一些虚幻的愿望而缺少实际行动。对待地位的正确态度应该是,地位虽是偶然得到,但应当把它当作原来就有的看待,在其位要行其事。地位虽然是暂时的,但要把它当作终身来看待。地位以外地东西,不敢想也不愿想得到。时下为官者常常觉得仕途不畅,就是因为受到地位、名利、情欲的困扰。如果自己在所处地位中尽了力,不觉得才能未能施展,那么心情自然顺畅。



历史人物

吕梁故事